



美育丛书 / 钟仕伦 主编

魏晋南北朝美育思想研究

Weijinnanbeichao
Meiyu Sixiang Yanjiu

钟仕伦◎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美育丛书 / 钟仕伦 主编

魏晋南北朝美育思想研究

Weijinnanbeichao
Meiyu Sixiang Yanjiu

钟仕伦◎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魏晋南北朝美育思想研究/钟仕伦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11

(美育丛书)

ISBN 7-5004-5901-7

I. 魏… II. 钟… III. 美育—思想史—研究—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 IV. G40-092.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33868 号

责任编辑 周晓慧
责任校对 林福国
封面设计 毛国宣
版式设计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丰华装订厂

版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4.125

插 页 2

字 数 338 千字

定 价 32.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钟仕伦 汉族，四川成都市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四川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四川师大美学研究所所长(兼)、中华全国美学学会理事、全国教师教育学会常务理事、四川省美学学会副会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8)，为四川省学术带头人(2001)。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学术刊物上发表《中国古代南北审美文化的差异及其成因》等论文五十余篇。出版《金楼子研究》、《当代中国传统美学研究》学术专著两部，合著6部。荣获四川省人民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奖二等奖一项、三等奖三项，四川省高教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两项、二等奖一项。主持国家社会基金项目两项、教育部重点项目一项。

《美育丛书》编委会

主 编 钟仕伦
副主编 李天道 董志强
编 委 钟仕伦 董志强 李 诚
 李 凯 李天道 唐小林
 钟 华 刘 敏 申喜萍
 余 虹
顾 问 皮朝纲 曹顺庆 万光治

目 录

导论	(1)
第一章 人物品评的美育思想	(15)
第一节 崇尚言谈、思理之美	(16)
一 谈玄之风韵	(17)
二 谈玄之人物	(19)
三 谈玄之内容	(22)
四 谈玄之方式	(32)
第二节 标举玄远、放达之美	(36)
一 玄远放达的表现方式之一——服药行散	(37)
二 玄远放达的表现方式之二——纵酒酣畅	(42)
三 玄远放达的表现方式之三——重情适性	(51)
第三节 追求容貌、神明之美	(62)
一 妙姿容	(62)
二 好神情	(69)
第四节 人物品评对中国美育思想的贡献	(77)
一 人物品评与自然美和艺术美品评的融通	(77)
二 人物品评与若干重要美育概念的形成	(84)
三 人物品评对中国文艺批评和美学思想的影响	(92)

小结	(97)
第二章 《世说新语》与魏晋士人的人格美	(98)
第一节 魏晋士人的觉醒与人格美的多元化	(106)
一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觉醒的原因	(106)
二 觉醒后的士人特征	(112)
三 多元化人格美的呈现	(114)
第二节 儒学精神与士人人格美	(115)
一 诚：儒学精神的核心	(115)
二 从《世说新语》中的孝礼看魏晋士人人格美	(117)
三 玄心与越礼	(124)
第三节 新自然观与士人人格美	(127)
一 新自然观概说	(127)
二 人与自然同构	(131)
三 人与自然同情	(134)
四 自然美对士人人格美的影响	(137)
第四节 士族佛学与士人人格美	(142)
一 死神唤醒人	(142)
二 佛学的中国化	(146)
三 士族佛学对士人人格美的影响——以“隐士 宰相”谢安为例	(152)
第五节 余论：艺术人生与人格陶冶	(156)
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世族家庭美育思想	(162)
第一节 中国传统家庭美育的历史溯源	(163)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世族家庭美育概况	(168)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世族家庭美育繁盛的时代背景	(169)

一	政治制度对世族家庭美育的影响·····	(170)
二	庄园经济对世族家庭美育的影响·····	(175)
三	审美风尚对世族家庭美育的影响·····	(176)
第四节	魏晋南北朝家庭美育的内容·····	(180)
一	人伦之美的教化·····	(180)
二	艺术之美的熏化·····	(192)
三	自然之美的濡化·····	(202)
第五节	魏晋南北朝家庭美育的实施特点·····	(206)
一	注重身教, 强调体验·····	(206)
二	创造情景, 在活动中引导、启发子弟·····	(209)
三	利用家族荣誉感进行激励教育·····	(212)
四	利用家诫、家训·····	(214)
五	利用蒙书施教·····	(218)
六	利用经史子集·····	(218)
第六节	魏晋南北朝世族家庭美育的影响·····	(219)
第七节	魏晋南北朝家庭美育对现代家庭美育 的启示·····	(226)
小结 ·····	(227)	
第四章	魏晋南北朝的旅游美育思想·····	(229)
第一节	“游”与魏晋哲学思潮·····	(230)
一	“游”字溯源·····	(231)
二	从“旅”“行”到“游”·····	(235)
三	“游”的哲学文化背景·····	(238)
第二节	“游”与魏晋人生命意识的觉醒·····	(249)
一	魏晋人对生命的热切呼唤·····	(249)
二	从“比德”走向“畅神”·····	(254)

第三节 魏晋“游”的类型及其美学特征·····	(259)
一 玄游·····	(259)
二 仙游·····	(266)
三 释游·····	(270)
第五章 山水绘画美育思想·····	(275)
第一节 山水绘画美育思想产生的背景·····	(278)
一 山水画的分离、初创·····	(280)
二 山水画的理论核心：自然观·····	(284)
第二节 山水绘画美育思想产生的渊源·····	(289)
一 儒家思想的痕迹·····	(290)
二 道家思想的影响·····	(292)
三 佛家思想的烙印·····	(296)
第三节 宗炳的绘画美育思想体系·····	(301)
一 “澄怀”——审美心境·····	(302)
二 “应目”——审美观照·····	(307)
三 “味象”——审美体验·····	(313)
四 “神思”——审美想象·····	(318)
五 “畅神”——审美境界·····	(326)
第四节 宗炳绘画美育思想在中国美学史上的地位·····	(330)
一 山水绘画美育思想的建立·····	(330)
二 山水绘画创作方法的初创·····	(333)
小结·····	(335)
第六章 “二王”书法美育思想·····	(339)
第一节 “二王”书法美育思想的特征·····	(341)
第二节 “二王”书法在书法史上的地位·····	(345)

一 上古书法·····	(346)
二 多元互动的魏晋哲学思潮·····	(353)
三 “二王”书风——中国古典书法成熟的标志·····	(361)
第三节 飘逸灵秀——个体价值的张扬·····	(372)
一 飘逸灵秀的书风·····	(374)
二 个体价值的张扬·····	(380)
第四节 自然洒脱——人格价值的肯定·····	(395)
一 自然洒脱的书风·····	(397)
二 人格价值的肯定·····	(402)
第五节 萧散玄远——终极价值的关怀·····	(413)
一 萧散玄远的书风·····	(415)
二 终极价值的关怀·····	(420)
小结·····	(429)
参考文献·····	(432)
后记·····	(440)

导 论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十分奇特的时代。在这个政治最混乱、社会最黑暗而在精神史上却是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富于激情的丰富多彩的时代里，产生了灿烂辉煌的文学与艺术。国家的动乱、社会秩序的解体，旧礼教的崩溃、思想和信仰的自由、艺术创造精神的勃发，使得文学艺术逐渐摆脱了政治和教育的附庸地位而独立发展。书法、绘画、音乐、建筑、雕塑等等，也都以昂扬蓬勃的生机令人刮目相看。

—

魏晋南北朝时期悲观主义盛行，人们慨叹人生苦短，追求及时享乐，玄学、清谈盛行，人们对自身的品评修养格外重视，魏晋时期政治昏聩，战乱频仍，从西晋的瓦解到东晋的建立，贵族士大夫饱受战争之苦，生活颠沛流离。“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人生寄一世，奄乎若飘尘”“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从这一时期留下的文字资料中我们可以深深体会到那种慨叹“生死无常，红颜易老”的情绪。从表面上看，这是一种悲观主义、怀疑主义的论调，慨叹人生苦短，追求及时享乐，所以“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

但在这种怀疑论调下，更深层次表现的是人对社会、对人生、对自我的一种反思——既然人生无常，那么权力、荣耀、信仰、道德又有什么意义？所有这一切，都不能阻挡年华的逝去，都不能抵御疾病与困苦；而且对于权力的追求反而会加重生命的负担，那么人在短短的一生中为了这些“身外之物”而惶惶不可终日又有什么意义？儒家所宣扬的仁义道德在国势日渐衰微、政治腐败、宫廷生活糜烂的魏晋时期已经完全失去了现实意义，信仰出现了危机，人们关注的重点开始从社会的、伦理的方面转向对人自身的关注和思考，开始注重提高自身的品性、修养及格调。这是“人的自觉”的表现，是一种对人的本体的关注。对人的存在价值的慨叹、对人的生存意义的思索，将魏晋思想引向了玄学。玄学的终极目标就是要寻求一种理想的人格，所以魏晋时期的人物品评极大地推崇才情、品貌、风度、言谈、智慧、识鉴、个性等，这与秦汉的标准是不一样的。这种带有审美性质的人物品评的特征可以概括为重才情、崇理想、标放达、赏容貌等几个方面，完全适应了士族们的贵族气派，讲求脱俗的风度神采便成了这一个时代的美学思想。

这一时期，士人崇尚玄学，追求超脱世俗，讲求精神至上的理想主义和审美的唯美主义倾向。这种精神状态的改变体现在生活方式的改变，追求精神的放达、形容的俊美和神采的飘逸上。这一生活方式体现在服装上首先是款式的“松”。秦汉时期的深衣紧紧裹在身上，而魏晋时期的男装则宽衣博带，《晋书·五行志》云：“晋末皆冠小而衣裳博大，风流相仿，舆台成俗。”这种装束尤其得到文人雅士的青睐。因为衣一旦宽，带一旦博，必当随风舞之，必当十分潇洒自如，必当十分彰显人的才情与格调，“飘如游云，矫若惊龙”“濯濯如春月柳”

“谡谡如劲松下风”，体现出一种超脱世俗的美。更有藐视礼教、潇洒放达如“竹林七贤”者，“裸袒蹲夷，或濯脚于稠众”，袒露胸膛，宽衣斜挂，把酒清谈。这种反传统的穿着方式和生活方式实际上是对封建礼教的蔑视，是个性、思想、品格和操尚的彰显，是同魏晋人超脱凡俗的内在追求相一致的。此时的人们追求的不是功名、学问、品德操尚，而是其内在的人格。这种人格体现在人的才情、性貌、品格和风神上，这是人的一种觉醒，而这种觉醒是在对旧传统、旧信仰、旧价值观念和旧的习俗的破坏、对抗和怀疑中取得的。

从美育思想发展史的视域来看，可以说，这一时期是中国美学的自觉期，亦是中国美育理论的发展分化期。这一时期，儒家所主张的“教化”理论的“中和”美育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出现了一大批具有美学价值和美育理论价值的著作。就文学艺术来看，文学方面，有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绘画方面，有宗炳的《画山水序》，王微的《叙画》，谢赫的《古画品录》；音乐方面，有嵇康的《声无哀乐论》，阮籍的《乐论》；书法方面，有卫夫人《笔阵图》，王羲之的《书论》等。同时，这一时期还形成了中国传统的审美范畴、概念、命题。如气、神、妙、意、情、势、风骨、形神、隐秀、神思、妙境、意象、气韵等范畴和概念，几乎都在这时产生或成熟。在人生美育方面，有关人格塑造、人生修养、人物品评也更加深入。先秦两汉，有关审美人格与品评的理论分为文与质、美与善两层。汉末则归类为三，分为九个方面，即神与情一类，属神；筋与骨一类，属骨；色仪容气言一类，属肉。而到了魏晋，则从审美方面着眼，突出了神、骨、形。魏晋时期，人们往往从审美角度以物以景评人。如“王公目太尉，岩岩清峙，壁立万仞”“世目李元礼，谡谡如劲松下

风”等。这种审美评论方式，最深刻地反映了中国美学的经验性、直觉性、体悟性的特点，较好地适应了由言入意、得意忘言地直接体悟事物最深处的中国思维方式，从而在中国美学中获得了牢固的地位，出现了第一部系统的文艺理论巨著——刘勰的《文心雕龙》。该书从“温柔敦厚”的“诗教”出发，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厚道”“征圣”“宗经”的口号和“文以明道”的原则。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些有悖于汉代儒家“诗教”和“乐教”的理论。如嵇康的《声无哀乐论》认为音乐的本质在于形式美，与情感无关，这就鼓励了整个魏晋南北朝美学对形式美的追求。而梁代萧纲在《诫当阳公大心书》中所提出的“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慎，文章且须放荡”，就否定了艺术是教化的工具，肯定了艺术的相对独立性。

这一时期的家庭美育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与深化，出现以家庭美育为主体的家族美育。这一时期，尤为引人注目的是自然美育与人生美育的兴盛，注重对人自身的美的欣赏，注重人物品评成为这个时代社会生活中极其重要的现象。

“人物品评”又叫“人物品藻”或“人品”，属于对社会美的审美认识，是中国美学史上第一次对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审美评价，是当时的一种时代审美思潮。它的特点在于不是仅仅欣赏人的形体自然因素，而更多的是鉴赏人的风采气度，把对人审美的自然因素和社会属性高度统一起来。人物品评，并非始于汉末魏初，而是从先秦以来便有的一个传统：春秋战国时期，列强争雄与长期的兼并战争，使挑选人才成为诸侯国存在和发展的迫切问题，当时以骨相外貌和仪表言行来判断人的贵贱贫富、寿夭吉凶的相人之术就已存在，这种人物评论虽为迷信之谈，但其中也存在一些合理因素，尤其是它对人物的内在精神和外在形体之间的某种联系的认识，对后来的人物品评有

很大的启发。古代儒家也注意对人物德行和才能的观察和评论。孔子十分重视“知人”，他根据人的气质和天赋的差异，将人分成“德行”“言语”“政事”“文学”^①四类，又把人物分成“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学之”“困而不学”^②四类，他还把人格的道德修养分成“知之”“好之”“乐之”三种境界。这种将人划分等级和分别品题人物的方法对魏晋人物品评产生了很大影响。孟子继承孔子的思想，不但提出“知人论世”的命题，而且还发展性地把人在人格道德修养上所达到的境界划分为“善”“信”“美”“大”“圣”“神”六个等级，并且明确地把它们应用于人物品评。

人物品评到了汉代开始受到普遍的关注和重视，统治阶级采取“察举”“征辟”^③的方法选拔人才，以“孝悌”“孝廉”等道德范畴作为衡量人才的主要标准，这就使人物品评与社会实际需要结合起来，大大加强了人物品评的社会意义，更促进了人物品评的发展。至东汉末年，由于宦官专权，政治腐败，于是出现了与宦官势力相对立、相抗衡的士大夫知识分子的“清议”，即“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④。这种清议通过臧否人物即品评人物干预朝廷对官吏的选任并抨击朝廷腐败政治，起到了一定的“舆论监督”作

① 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10页。

② 同上书，第177页。

③ “察举”是由朝廷下诏，规定所需要人才的性质，让地方政府在境内发现这种人才，推荐上去。“征辟”是各地方政府选拔人才给自己用，或朝廷直接从布衣或地方上卑微官吏中征召有名望的人来做官。

④ 范曄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六十七，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2185页。

用，以致朝廷有时不得不“随所臧否，以为与夺”^①。因此一些有影响的名士的评论品题直接关系到士人的升迁提拔和政治前途，“有名者入青云，无闻者委沟渠。朝廷以名为治（顾亭林语），士风亦竞以名行相高。声名出于乡里之臧否，故民间清议乃隐操士人进退之权。于是月旦人物，流为俗尚；讲目成名（《人物志》语），具有定格，乃成社会中不成文之法度”^②。因此，人物品评受到整个社会的高度重视，遂成风气。

汉末天下大乱，衣冠大族多离本土，士流播迁广泛，使汉代视品德操行而行辟举的制度再难施行，“清议”的程序和机构也随之被破坏，所谓“四人错杂，详核无所”^③，知一个人德行，当作长期考察，但是官吏要视事，不可拖欠，这时候能看的就只有人的气质是否超举与才性是否通敏了，曹魏政权取代汉刘氏政权后，曹操出于政治需要，连下四道求贤令，提出“明扬仄陋，唯才是举”^④的主张，故品评人物以才性更为风气，变东汉的重德轻才为重才轻德，刘劭的《人物志》集中体现了这一思想原则。继曹丕执掌政权之后，命陈群创立了九品官人法，即九品中正制，在各州设大中正官，各郡县设小中正官，代替宗族乡间来考察和评定人才优劣，但是由于在汉末魏晋的历史条件下，门阀士族是社会上举足轻重的力量，故这一制度很快被门阀士族所垄断，人物品评已被士族门阀所操纵，官吏的实际任用主要不再依靠自身的智慧才能，而是取决于出身门

① 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六十七，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2232页。

② 《汤用彤学术论文集：魏晋玄学论稿》，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02—203页。

③ 杜佑撰《通典》卷十四，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603册·史部三六一·政書類，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50页。

④ 陈寿撰，陈乃乾点校《三国志》卷一，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32页。

第的尊卑，因此这时的才性之辨、人物品鉴便与现实政治中的选举、用人逐步脱节，而与正在兴起的文学清谈合流，转向哲学性质的对社会理想和人生意义的本体性的探讨和审美性质的对人物才情风貌的品赞。从政治性人物品评到哲学（美学）和审美的人物品评的转变，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

第一，从政治上看，魏晋时期是一个大动荡、大分化、大变革的时期。东汉之后，先是魏、蜀、吴三国鼎立，继起的西晋统一，仅维持半世纪即演为离乱。在北方，先有十六国割据，后有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的嬗递；在南方，则有东晋、宋、齐、梁、陈的更迭。在此期间，战争连绵，动乱不断，造成死亡频繁，人口锐减；两汉属于我国历史上的宇宙期之一，因此自然灾异泛滥，山崩、地震、狂风、水旱、蝗灾此起彼伏，群发夹攻，加之连年征战，瘟疫不断。《三国志》载：“建安二十二年，（司马朗）与夏侯惇、臧霸等征吴。到居巢，军士大疫。”^①曹丕于建安二十二年大疫之后，在致其好友吴质的书中说：“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②曹植的《说疫气》一文记载了疫病流行、死亡接踵的惨景：“家家有强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举族而丧者。”^③无数人的生命被吞噬，性命如蚁；时局的动荡纷争，引起上层统治集团内部的互相斗争，许多士族文人被卷进了政治斗争的漩涡，惨遭杀身之祸，故史云：“魏晋之际，天下多

① 陈寿撰，陈乃乾点校《三国志》卷十五，第468页。

②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四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91页。（信中的徐、陈、应、刘指曹丕的好友徐干、陈琳、应璩、刘桢，均是“建安七子”中人。）

③ 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3351页。